

《神州在望》：二十世紀澳門錯位的記憶*

周夢媛

[摘要] 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因其對澳門社會獨到的解讀而成為澳門葡語文學中不可忽視的一位作家。她的作品《神州在望》描述了20世紀的澳門，特別着重刻劃了那些處於現實與過去的十字路口中的、尋找自我的人物形象。時間點之間的錯位最終構成了記憶的錯位，更影響了這些人物在新的社會中身份認同的重塑過程。布拉加在本書中對記憶的特殊敘述更使人物在這一過程中的思想特點更加突出。

[關鍵詞] 澳門 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身份認同 文化錯位 文化記憶

一、何為“錯位”又為何“錯位”

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 是葡萄牙20世紀一位傑出的女作家，她的諸多關於澳門以及中國的文本都成為了研究澳門葡語文學不可或缺的資料。其作品《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 於1968年出版，後由金國平先生譯為中文並於1991年由澳門文化署(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出版。著名的葡萄牙文學評論家烏魯華洛·達華烈斯·羅德禮傑 (Urbano Tavares Rodrigues) 對該書曾作出這樣的評價：“她身處東西方交匯點——澳門。作者的博愛精神，作者的脈脈溫情，作者對周圍人問題的獨到見解使她得到了素材，進而為我們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①在筆者看來，這一系列的人物雖然性格各異，但他們都有共同的成長背景——中國大陸。他們在其生命或早或晚的階段，因為各種原因來到澳門，因此，我們可以把他們視為生活在兩種文化、宗教、政治的夾層之中。霍米·巴巴 (Homi Bhabha) 的“夾層性空間”(in-between spaces) 概念認為：“諸種二元對立(如階級、種族、性別等)的認同思維必須揚棄，他考察不同文化接合之處的‘夾層型空間’，並稱之為‘夾縫’，指稱存在於

作者簡介：周夢媛，澳門大學葡文系碩士研究生。

* 本文為澳門大學主辦的“自傳文本及歷史構建國際研討會”(Memorialist Discourses and the Building of History) 會議論文。The paper is connected with two UM projects - Memorialist Discourse and the Building of History: The Case of Macau (Ref No.: SRG2015-00003-FAH/UM) and Literature of Macau in Portuguese - The Postcolonial Approach (MYRG2014-00016-FAH).

①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1年。

理性規劃空間之中的各種混亂、差異、疊合、並存的元素，可鬆解行動主題相互之間對於國族、共同體利益、文化價值的單一想像。”^①而在這樣的夾層底下，他們都在不同程度地經歷着某種錯位。

這裏的“錯位”(displacement)有兩重含義。其一為地理和情感上的錯位。書中很多人物都背井離鄉，戰亂或者社會環境迫使其離開熟悉的家鄉，逃到澳門這個陌生的城市，地理上的變換或多或少的造成了情感上的錯位，進而影響了他們對自身個體回憶的處理。類似的情節我們似乎並不陌生，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一書中刻劃的也是一群因國民黨戰敗退守台灣的“大陸台北人”。“書中人物形體都生活於現在的台北，但精神上卻以當年大陸的生活記憶而存活着，有些人幾乎完全生活在‘過去’裏，即使能接受現在，適應環境的人物，也保持着對‘過去’的濃厚懷念，而不能釋懷，隨時會想起過去的生活、排場，處處拿現在的台灣跟過去的大陸相比”。^②《神州在望》中的人物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有些完全活在過去，不肯面對現實；有些活在當下，卻不能忘懷過去的故鄉、故人；有些成長在澳門，但祖輩口中對過去的記憶，帶給他們的更多的是對自己身份的迷惑。

在另一個層面，這種“錯位”如何體現在對人物記憶的敘述上，這也是布拉加本著中最為人稱道的地方。在傳統敘述中，對記憶的敘述幾乎都被用來鞏固人物外在的現實以塑造現實中人物的形象。換言之，記憶在敘述中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文化指涉來豐富當下的人物。讀者通過敘述者或回憶主體，以回憶的敘述來瞭解當下的人物形象。這種記憶的敘述功能曾多次出現在諸多作品中。例如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追憶似水年華》(*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對“瑪德琳蛋糕”的“非自主性記憶”回憶，^③主人公的記憶是“被動的”被外界的事物或者感官上的體驗所喚起的。最經典的莫過於當主人公嚐到瑪德琳蛋糕時的場景，蛋糕的香氣牽引出一連串與主人公相關的記憶和所有過去。我們通過這種“非自主性回憶”來一點一點地瞭解當下主人公的形象。另一類非常典型的記憶敘述方法是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自傳體式”回憶或者稱為“自主性”回憶敘述。^④在其作品《洛麗塔》(*Lolita*)中，主人公亨伯特對於洛麗塔以及二人相處時的種種細節的主觀回憶，為讀者全方位地展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點。但無論是普魯斯特式或是納博科夫式的回憶敘事，對記憶的敘述與小說人物塑造之間都是互相肯定的關係。回憶的目的在於更好地感受現實，通過回憶對現實的指向，作者對人物當下的塑造便更加豐滿、真實。

然而，在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的作品中，回憶卻不以相同的形式呈現出來。在《神州在望》中，作者摒棄了傳統意義上的回憶在幫助塑造人物現實的功能，轉而將其作為敘述的主體，並通過回憶與現實的衝突、割裂、否定，來展現人物內心的衝突。在此，筆者選取《神州在望》中的《太陽之子》、《風神》和《瘋女》三種敘述典型來進行分析。三個故事中，對過去的回憶

① 李承機、李玉霖：《“帝國”在台灣——殖民地台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台灣：“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第51頁。

② 楊馥菱：《歷史記憶的召喚與國族認同的消解——評白先勇的〈台北人〉》，《成大中文學報》(台南)1998年第7期。

③ 鍾麗茜：《“非自主記憶”的詩學功用——從〈追憶似水年華〉看審美回憶》，《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溫州)2007年第20卷第2期，第31頁。

④ 秦起秀：《記憶與人物形象：以〈洛麗塔〉為例》，《世界文學評論》(武漢)2010年第1期，第90頁。

或擾亂我們的現實、或完全取代現實、或在對記憶的敘述中完全失語。

本文旨在結合上述兩個層面的“錯位”進行分析，以瞭解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是如何運用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敘述方法，去展現人物在空間和情感上錯位後產生的文化錯位現象，進而探究不同的人物在中葡兩種文化交融中如何重建自身的身份認同。

二、《太陽之子》——虛幻的現實與真實的記憶

事件真真切切地發生在我們身邊，本應是最真實的，而回憶作為不可考證的經歷載體，本身就存在不可靠性，我們通常見到的文學作品中的回憶都是如此。但在《太陽之子》中，一切似乎都被顛倒過來。

故事發生在聖誕夜，講述了一位身懷異族骨肉的女人的故事。文中幾乎所有與當下有關的描述都是超現實的。那些平日朝夕相處的好友，那怪誕的聖誕之夜，都變得極其陌生：“為甚麼人們這樣盯着我？姑娘們……好像從未見過我似地……我有些頭暈目眩。要是失去知覺怎麼辦？”^①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舞蹈也帶着詭異的氣氛，“在聖嬰耶穌基督降生圖模上的蠟燭的光亮下，那組師生在半莊嚴半是敵對的氣息中別别扭扭地在交誼”，蠟燭昏暗的光亮下，“人們的臉都奇怪地拉長了”，就連對大廳的描述都瀰漫着奇怪的感覺，“瓷磚地上顯出了十分明顯的十字圖案，頂棚、四壁、門都變了形，消失在夜的黑口之中”。^②

所有身邊的人、現實的環境，在主人公的敘述下都給人以不真實的感受。儘管真真切切地身處於當下，但主人公的存在卻好像是置於這個真實世界之外的“他者”。與此同時，當回憶開始登上敘述舞台的時候，一切又出乎意料地變得真實了。在回憶家鄉的生活時，主人公有這樣的一段文字：“她的故鄉在世界的盡頭，那裏有雪景，家人在那個夜晚一定很懷念她，也許會給她寫信，也許會給她寄禮品，家鄉的飯菜，杯子的叮噠，中斷的交談，歡聲笑語。”^③

此刻，我們擁有的是與之前虛幻的現實的鮮明對照。對過去回憶的敘述，讓人感覺到某些東西好像就近在眼前、伸手可觸。飯菜、歡聲笑語，甚至是杯子的叮噠響動都歷歷在目。現實卻像是抓不住的魅影，遙遠神秘。除此之外，文中另一個人物，與主人公來自同鄉的男子，在敘述者的敘述上也獨具特色。與開頭怪誕的教師與學生不同，這位來自北方的男子出現時便讓讀者感到現實的存在——“那人身上發出一股清幽的檀香味……多聰明的人！修長的身材，中國北方人？在那些身材矮小，粗魯無禮的廣東人中，他可稱得上佼佼者……他的雙唇吻過她，濕潤了她，鼻中的氣息噴射到她的皮膚上”。^④她甚至希望這中國男人是她腹中異族孩子的父親。我們可以把這種親近理解成對自身矛盾心理的寫照，一方面是過去以及其本身中國文化身份的懷念，但同時另一方面又懷有一個象徵着當下和西方文化的孩子。這難道不是澳門極其恰當的寫照嗎？自己中國母親的身份與現實葡萄牙的統治，不正是彼時的澳門所處的境地嗎？

①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1年，第47頁。

②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7頁。

③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8頁。

④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8—49頁。

在故事的字裏行間，我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主人公對於天主教這一西方產物的厭惡之情，例如她對腹中孩子的抗拒：“她腹中懷着一個異族的血骨，是一個她從未相識，從未愛過的人的兒子（此人出生在她來到世間前的幾千年）是不知羞恥帶來的虛偽的雜果。”^①在天主教的背景下，我們很容易聯想到耶穌基督降生的故事。作者將聖經中聖母瑪利亞由上帝托夢懷上耶穌的故事運用到一個中國女性的身上，並用她對這個孩子的恨間接烘托出對西方文化的抗拒。

作者在文中運用意識流的手法為我們編製出交錯的現實與記憶、喜與悲、真實與夢幻。這一段，我們讀到的是主人公與中國男人相處時的欣悅，但緊接着的下一段便可能是她內心灰暗的描寫。由此，虛幻的現實與具體化的回憶、對西方文化的抗拒與對家鄉中國有關的一切的親昵，都造成了人物在記憶層面的錯位，同時也是文化層面的錯位。

記憶在本文中，不再是對現實的指涉，而是影響着我們對現實生活、對人物認同的理解。更加真實的記憶是我們看到了主人公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想法，她深愛的仍是故鄉的一切，仍是那抹不掉的美好的過去。最終，主人公從教會學校辭了職，也是用這種方式來與自己不願面對的現實作出了斷。

這種拒絕對現實的指涉同時否定現實的敘述方式實在少見，主人公的性格特點不再有賴現實的經歷去塑造，而依賴於過去。這種敘事方法更好地突顯了像文中女主人公一樣在新澳門社會中不願接受西方文化的人們的內心選擇。

三、《風神》——丟失的記憶

如果說《太陽之子》中記憶與現實的關係，是雙方交織之下記憶不斷否定現實的話，那麼《風神》中對現實的敘述幾乎缺席，使得記憶佔據了主要地位。文中，對於三姑當下現實的描寫少之又少，但在她去世前風雨飄搖的那個夜晚，我們卻窺探到她的記憶。

文章的開頭，三姑就已經奄奄一息，但奇怪地是，當死亡一步步逼近，她卻“反而顯得很幸福”。^②從這裏，文中開始了對颱風來臨前凶猛風暴的描寫，這“宇宙萬物發狂之夜，也許是世界末日的預演……一條沙船着了火，另外一些繼之，火光片片”。^③正是在這絕望之際，祖母竟迴光返照，對過往的點點回憶也從她的喃喃之語與全知敘述者的評述中交叉地娓娓道來。

從三姑那雙三寸金蓮，彼時大家閨秀的象徵，足見三姑曾是達官顯赫之後，甚至“曾同王公貴族有過交往”。^④然而，戰爭的顛沛流離以及中國內地的長期無政府狀態，迫使她全家背井離鄉，成為難民——而這一悲慘的歸宿與三姑本身對自己身份的執着也成為了後文中孫子的感嘆：“難道你不知道嗎，帝國已經不復存在了，氏族、領主都統統沒有了？難道……”^⑤

①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8頁。

②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1頁。

③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1—42頁。

④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3頁。

⑤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3頁。

如今，或許是敘述者，或許是三姑的孫子，面對這種錯位都發出一聲嘆息：“死神在降臨，莊嚴肅穆，彌留之際壓倒了人間的一切恩恩怨怨。沒有祖國，沒有信仰，沒有族徽，死神在哪裏代表了一切。”^①與《太陽之子》中主人公對現實中的西方文化的反抗不同，《風神》中的三姑並沒有怎麼去接觸現實，她在主觀上不願嘗試去接受新的文化，而其結果也極具象徵意義——她在一個風雨飄搖的暴風雨之夜與一艘船一起消失在風雨裏，且隨她而去的，還有她那揮之不去的記憶。正如霍爾（Stuart Hall）的評論：“*The Past Continues to Speak to Us But It No Longer Addresses Us as a Simple, Factual Past*”^②孫輩在新的社會文化環境下成長，祖母一輩的記憶在錯位後失去了繼續傳承的土壤，因此，其記憶在孫輩身上得不到認同，終將隨着她的離去，一同沉入記憶之海。

廖咸浩先生對“身份”一詞曾有這樣的定義：“身份”其實是由“文化情感”與“現實策略”交織而成。文化情感之中帶着一種無以名之、仿若天生的固執，而現實策略則壓低包括情感在內、較為偏向“本質”的因素，強調以福祉或利害為依歸。身份的形成，便是建立在這兩種態度的辯證發展上。^③這裏的“文化情感”我們可以理解為對過去的執着，而“現實策略”則是對當下的妥協。身份的形成便是在過去的執念之於現實之下不斷妥協而形成的結果。對於祖母一代來說，她們的身份認同在這個妥協過程中傾向了對過去的執念，而現實則顯得微不足道，故此她們的認同如同三姑一樣，到死都是記憶中的曾經擁有的一切。反觀孫輩們，他們生在澳門，又或在記憶並不清晰時就被帶到澳門，他們的對過去的記憶，早已和澳門兩個字分不開了。因此，在文化情感上，他們很大程度都認同了澳門這個新的社會文化，祖母一輩的記憶已經不復於他們的記憶中存在了。

四、《瘋女》——失語的記憶

不論是《太陽之子》中的中國女人還是《風神》中的祖母，她們都對記憶有所敘述，因為過去還實實在在地存在於他們的腦海中，故仍有存在的意義。但在《瘋女》中，缺席的不僅是現實，更是記憶主體本身。

《瘋女》的主人公是一個逃難到澳門的女人，因一系列的打擊而最終發瘋，夜夜守在埋葬自己兒子的沙灘上，等待着永遠也不會再出現的丈夫。丈夫、兒子、故鄉等所有她與過去的聯繫都被一劍斬斷，剩下的只有她孤獨一人，無家可歸，無鄉可還。生活的打擊使她無法面對現實，也無法在澳門這個新的社會中從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這也注定了她的毀滅：“將愛子掩埋在河灘上後，每當夜幕降臨時便來此等候丈夫。她也是從夜色中逃出來的，丈夫也應該趁夜色出逃，夜色中死者可復活，每天晚上瘋女都在那裏等待。”^④

①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43頁。

② Patricia Brett Erens, “Crossing Borders: Time,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Song of the Exile*,” *Cinema Journal*, Vol. 39, No. 4 (Summer, 2000), pp. 45.

③ 張琴鳳：《華人新生代作家邊緣意識和身份構建比較論——以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馬來西亞為例》，《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濟南）2009年第2期，第152頁。

④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85頁。

埋葬的不僅是她兒子的屍體，更是她自己的肉體和靈魂，就像是文中女傭善萊所說：“她不會再死了。實際上，她已經是行屍走肉……她忽是血肉之軀忽是行屍走肉，她已沒有任何價值。”只有在凌晨：“她那已出竅的靈魂又回到她身上。這時，她才會明白丈夫不會來了，孩子也不再屬於她了。這是痛苦、醒悟、失落的嚎叫……”^①

在作者筆下，所有有關瘋女的敘述都由第三敘述者完成。我們所見到的現實，好像只有一個坐在海邊的背影，所有人物身上的血與肉都是“道聽途說”，由別人口中轉述而來。不同於《太陽之子》和《風神》中主人公記憶中對過去故鄉生活的美好回憶，瘋女在他人口中的這僅存的過去，也只限在她來到澳門之後的種種不幸，而瘋女本身並未開口講述過一句自己的過去——一個與過去的聯繫被完全砍斷的人的記憶“失語”了。不論是心理還是地理上的錯位，無數人對過去記憶的承載物都消失了。親人的離去、故鄉的傾覆，那些曾經的記憶變得像風中的沙，無處停泊。而這又何嘗是個特例呢？同樣的題材也曾在澳門土生作家江道蓮的短篇小說《旗袍》中出現。江道蓮筆下的瘋女因其家鄉被日本人佔領，丈夫被日本兵殘忍殺害，故無力在戰亂年代撫養幾個孩子，只能眼睜睜看着孩子們一個個活活餓死。在接連的打擊下，她和布拉加故事中的瘋女一樣變得神志癲亂，在絕望中盼望着永遠不會復生的丈夫和孩子回來團聚。^②然而，不同的是，在布拉加的《瘋女》中，回憶的主體並沒有參與到回憶敘事中，也沒有提供現實的參照。除此之外，與《旗袍》中的全知視角敘述相比，布拉加的故事採用了第一人稱敘述，而這本身就增加了敘述的不可靠性。這種不可靠性的敘述也正是布拉加整部小說所強調的人物在新社會中的“身份認同危機”的映射。

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布拉加筆下的這些人物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好像在澳門這個社會中處於“他者”的位置。這不僅反映了這些初到澳門的中國人對新社會、新文化的態度，同時也側面反映出布拉加作為一個生活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所觀察到的中、葡雙方文化交流中的種種錯位的現實。

在錯位的過程中，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用一種不同於傳統的敘事手法，為讀者塑造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物。在他們身上，對記憶的敘述不再為當下服務，而是變成了故事的主題，處於中心位置。在20世紀澳門中西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這樣的敘事手法讓我們看到了記憶在人物內心，以及身份認同重構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無論是對當下的否定，還是不願與當下對話，抑或放棄敘述過去的權利，我們看到的都是在那個特殊歷史環境下人物內心的掙扎、困惑與無助，這也讓我們從記憶這個敘述主題的新角度解讀《神州在望》一書。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葡]瑪利亞·翁蒂娜·布拉加 (Maria Ondina Braga)：《神州在望》(A China Fica ao Lado)，金國平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第86頁。

② 江道蓮：《旗袍》，姚京明譯，澳門：澳門文化司署／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115—118頁。